

试析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论述

王新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第一研究部, 北京 海淀 100080)

【摘要】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中国近现代史多有论述,解决了当时思想理论界面临的重大问题。邓小平这些论述体现了正确把握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从历史中吸取营养、增加智慧、获取力量等特点。邓小平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论述,堪称运用历史解决现实问题的典范。

【关键词】改革开放;邓小平;中国近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4)05—0058—07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他的文章和谈话中,对中国近现代史^①多有论述,从而解决了当时思想理论面临的重大问题。但思想理论界、学术界对此尚无多少研究。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对于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逻辑阐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转折。以这次全会为起点,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随着国门的打开,大批的公派和自费留学生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同时,国家还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长期封闭的中国人,过去从报纸上得到的西方资本主义的信息是:失业工人“依靠为数少得可怜的救济金过着半饥饿的日子”,“一大批没有参加工会的失业、半失业工人,则根本就没有救济金。他们有的靠做临时工度日,有的靠拣破烂糊口,朝不保夕。在日本,不少在码头干活的临时工,每天一大早就在招工地点排队等候受雇。有的人为了得到工作,甚至头一天的夜里就睡在马路上。”“在美国有许多穷人只好买

狗食和猫食充饥。”“穷人的处境正变得绝望了”^[1]。“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陷入严重困境”。^[2]那么,中国人对自己是怎么看的呢?权威的报纸是这么说的:“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3]然而,走出国门的中国人看到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景象:高楼大厦林立、马路宽阔、轿车川流不息、商店货物琳琅满目。很明显,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明显要比中国人高出许多。这些情况,必然对人们原先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概念产生强烈的冲击。

由于政策的改变,不少多年在海外漂泊的华人、华侨、港澳同胞,回到阔别的祖国和内地探亲、访友。甚至还有台胞,经过辗转,回到大陆探亲、寻根祭祖。他们给亲朋好友带来了彩色电视机、电子手表、录音机等当时人们非常稀罕的礼品。“文革”期间人们最忌讳被人说有“海外关系”,这时谁若有“海外关系”最令人羡慕。不言而喻,连中国的一般老百姓也开始认识到,外国甚至港澳台都比我们富裕。

1977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是

【收稿日期】2014-07-27

【作者简介】王新生(1954—),男,河南郑县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巡视员、研究员。

8700多美元,排世界的第五位;科威特排第一位,11000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1万美元;第三位是瑞典,9400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8800多美元^{[4]194}。而1978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只是375元^{[5]32},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1.5:1,合250美元。不难看出,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相差30多到40多倍。

过去极左年代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的夸大宣传和对外开放后人们发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活要比中国富裕数十倍时形成的巨大反差,再加上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存在的严重失误,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认识产生思想上的混乱。一些人乘机提出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张。中国到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好,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好?这是不能回避,必须给出明确回答的重大问题。

“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6]62}邓小平以此为命题,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逻辑,论证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第一,中国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文化方面落后,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是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造成的。邓小平不回避社会主义的中国目前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有很大的差距,认为“这是事实”^{[4]166}。但是,造成这种状况“首先同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有关,也与历代反动政府的腐败有关”^{[6]269}。他明确指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而“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6]292}他的结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4]163}

第二,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邓小平指出,中国从鸦片战争失败起的一个世纪以来,一些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在内,都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

义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6]205-206}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背弃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先后叛变革命。“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国民党统治期间,还发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对此,邓小平指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6]206}

第三,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中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邓小平指出“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4]405}“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②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4]163}邓小平没有回避新中国成立后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犯过错误,如在1957年反右扩大化;1958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1966年,又搞“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10年,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损失。“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4]167}中国已经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由此,他强调指出“由于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犯过错误,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4]337}。

由上可以看出,邓小平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逻辑,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从而澄清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混乱,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史实证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改革开放后,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进,广大党员、

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党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新景象。然而,极少数人利用中国共产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解放思想”旗号,夸大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错误,否定党的领导。

邓小平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史实,驳斥了这种观点,证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第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才站起来了。邓小平指出:“不要小视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只有几百人时,就推动“实现了国共合作,推进了北伐战争。以后革命失败了,只有我们的党才能够经得住十年的血腥恐怖,百万大军的‘围剿’,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因为有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千难万苦的奋斗,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4]267}“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4]299}

第二,中国共产党结束了北洋军阀政府以来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使国家真正实现了统一。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建立起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于1916年6月病死。这时的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大派系,相互争夺对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权。此外,各地还有一些不属于北洋系统的军阀。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都把军队当作自己的私产,凭借手中的武力实行军事专政,官僚、政客和土豪劣绅则是他们依靠的主要社会力量。为了巩固和扩大地盘,在不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各派军阀进行着的争夺地盘以至战争,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这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1926年7月至1927年7月,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口号的北伐战争,虽然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北洋军阀统治面临崩溃局面,但在帝国主义的

支持下,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先后叛变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北伐战争中途夭折。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后,军阀割据的局面仍然没有改变,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形成了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四大派系,在各省也有大大小小的军阀。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国民党政府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是表面的、暂时的,很快又被军阀混战所代替,尤其是1930年的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和与李宗仁、张发奎在湘粤桂边的战争,共投入一百万的兵力,总耗资达5亿元,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可以说,一直到国民党南京政权覆灭,也没有真正实现全国的统一。军阀割据,国家不统一,是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真正实现了统一,为中华民族发展、繁荣,实现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条件。邓小平指出“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是自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只要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那就不仅能够把全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合起来,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4]267}他认为,“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4]170}“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4]391}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4]267-268}

第三,要正确看待党的历史上的错误。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发展,走过了曲折道路。很长时期比较顺利,但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6]234}他经常谈到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犯过的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但强调“错误总还是由我们党自己纠正的,不是别的力量来纠正的”。^{[4]267}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认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

靠的。”^{[6]234-235}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事实科学地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一切。

三、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教训来证明对外开放的必要性

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是中共解放思想、打破封闭僵化枷锁、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而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对外开放一实行,立即取得明显成效,突出表现是设立经济特区。邓小平是设立经济特区的坚定支持者。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听了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关于在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和侨乡汕头开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非常赞同这个设想。当听到“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大家意见不一致时,邓小平当即表示“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7]510}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和福建省的提议,并作出关于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和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的决定。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予更多的自主权,扩大对外贸易,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3月,中央同意广东省的建议,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经过短短的四年时间,深圳、珠海这样昔日边陲小镇、荒滩渔村,就变成了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成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前沿区,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对外开放取得明显成效,然而,一些人仍抱着僵化的思想不放,对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持质疑甚至抵触态度。他们怕对外开放会引来资本主义,特别是一些老同志,担心自己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开放,突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怕中国会变成资本主义。

针对这种思想状况,邓小平首先从历史的角度

论证了实行开放的必要性。他认为,现在世界上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中国在历史上就吃过闭关自守的苦头,指出“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6]90}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6]64}。“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6]90}在叙述了近代以来中国闭关自守的情况后,邓小平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6]78}中国“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6]90}

其次,邓小平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了中国实行开放不会变成资本主义:(1)将西方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管理方法同资本主义区别开来。过去,有一个误区,即把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管理方法在内的一切,都认为是资本主义而加以排斥。邓小平认为,有些同志怕对外开放会引来资本主义,关键是没有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4]351}(2)引进外资和先进生产技术,不会影响社会主义公有制。邓小平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采取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4]351}(3)实行开放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但不可怕,可以克服。邓小平指出,实行开放,肯定会带来一些资产阶级的腐朽的因素,并提醒大家“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他认为,没有什么可怕,这些消

极因素“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6]90}

邓小平这些科学论证,对于解除一些人对对外开放的疑虑和质疑,加快对外开放步伐起了重要作用。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再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接着,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建立海南省并作为经济特区。这些地区为外商投资提供优惠,充分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本地优势,兴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扩大对外贸易。外商在我国投资项目和资金逐年增加:1979-1982年,投资项目920个,合同外资金额49.58亿美元;1983年,投资项目638个,合同外资金额19.17亿美元;1984年,投资项目2166个,合同外资金额28.75亿美元;1985年,投资项目3073个,合同外资金额63.33亿美元;1986年,投资项目1498个,合同外资金额33.30亿美元;1987年,投资项目2233个,合同外资金额37.09亿美元;1988年,投资项目5945个,合同外资金额52.97亿美元^③。对外开放,使我国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进出口总额大幅度跃升,1978年为206.4亿美元,1988年达到了1027.8亿美元^④,是十年前的5倍,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得到发展壮大。

四、以中国近现代史来表明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和管理好香港的自信

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回归提到了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香港是英国通过1842年的《南京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和1897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夺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从战略全局的角度考虑,没有立即收回香港,而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使香港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同时,香港得到了内地的一系列支持,如在必需的食品、日用品、淡水、燃料、工业原料等方面以优惠价格大量供应,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快速发展,创造经济奇迹提供了重要保证。事实证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是对祖国内地和香港都有利的正确方针。

中国政府“长期打算”的底线是1997年,进入80年代后,离这个期限越来越近。由于香港给英国

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对英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英国政府希冀正把现代化建设作为重心的中国政府继续保持香港现状,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

1982年6月,英国在同阿根廷的马岛之战中获胜。同年9月,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邓小平会见了她。撒切尔在会谈中坚持“历史上的条约按国际法仍然有效,一九九七年后英国要继续管理香港。”^{[6]84}邓小平明确地告诉撒切尔“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6]12}针对撒切尔的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的说法,邓小平当即表示“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6]13}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分别会见了香港工商界访问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又一次批驳了中国不能管理香港的说法。他指出“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侮辱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变了中国的形象。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蒋氏父子创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香港人也是有这种民族自豪感的。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6]60}

邓小平以中国近现代史来表明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向全世界展示:(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是晚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那样代表少数反动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权,是代表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权。中国已经强

大起来了,中国人民不可侮。再用老殖民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企图欺辱中国人民,注定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事实说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国家事务。中国人不仅能够治理好香港,而且对自己国家的未来,对民族复兴,充满信心。

五、倡导用中国近现代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改革开放后,在对外活动中,党和国家提倡中国人和外国人发展正常交往。这对于加强我国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是必要的,对于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也是必要的。由于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产生崇洋媚外思想。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由于对少数青少年的教育不够,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有些青年学生,还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等。

邓小平严厉斥责这种现象,指出“现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4]337-338}他认为“这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4]337}表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6]13}提出“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4]369}

邓小平认为,一些青少年之所以出现崇洋媚外、崇拜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等问题,是“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6]198}要改变这种引导不力的软弱状态,青年人不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6]206}。如何学习中国近现代历史?他提出“我看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个学习必须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样就能了解党是怎样领导

革命的,了解毛泽东同志有哪些功绩,使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是怎样成功的。”^{[4]381}

“六四”风波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面对西方的威胁,邓小平指出“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6]357-358}

邓小平结合中国近现代历史,抨击了西方七国对中国事务的粗暴干涉,指出“中国人吓不倒”。“我们要扎扎实实干自己的事,但谁要干涉或吓唬我们,都会落空。中国人有自信心,自卑没有出路。过去自卑了一个多世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了。庞然大物吓唬人,中国人不怕。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抗美援朝打了三年,我们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传统。”^{[6]326}“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6]329}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强则国家强。知耻而后勇,青年只有了解中国过去苦难的历史,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才能挺起民族的脊梁,承担历史重任,勇敢面对一切困难,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邓小平要求用中国近现代史教育青年,充分体现出一代伟人的远见卓识。

六、结语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论述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正确把握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下,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邓小平在论述中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尽管政权不断更迭,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仍没有变,中国继续贫穷下去,人民处于悲惨的生活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

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革命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党又领导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方面的差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事业。由此,邓小平的结论是: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犯过一些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大错误,但“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4]298-299}正是正确把握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邓小平找到了中国准确的历史方位,明确了党和人民的历史任务,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澄清人们在思想问题、历史问题等方面的错误认识,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力量。

第二,从历史中吸取营养,增加智慧。历史是一个不间断发展的一环套一环的链条,是昨天、前天以至更远的已经发生的事实。今天是从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将发展为明天、将来。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好,必须认真总结过去成功的经验和失败、挫折的教训。邓小平论述中国近现代史,不是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着眼于现在,开辟未来。正是因为如此,他把党的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挫折的教训都视为宝贵的财富,认真总结,从中吸取营养,增加智慧,领导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方针、路线、政策。邓小平能成为大智者、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应该是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从历史中获取力量。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多世纪,是中国饱受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华民族充满屈辱和苦难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带领人民经过28年奋斗,终于

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经历了曲曲折折。中国近现代历史,是苦难与辉煌交织的历史,也是波澜壮阔的历史。邓小平善于从历史中获取力量。他把中国近现代史看作是一种精神动力,能够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激发斗志,攻坚克难,顶住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威胁、干扰,最终取得胜利。

学习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是为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邓小平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论述,堪称运用历史解决现实问题的典范。

注释:

- ①本文所指的中国近现代史包括革命史和中共党史。
- ②即1978年。
- ③这些数字转引自金哲松、李军著《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与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53页。
- ④转引自金哲松、李军著《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第3页。

参考文献:

- [1]梅鸣. 资本主义劳动人民的贫困和斗争[N]. 人民日报, 1975-01-02.
- [2]石基平.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陷入严重困境[N]. 人民日报, 1973-12-30.
- [3]上海气轮机厂国际问题研究小组.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N]. 人民日报, 1975-02-01.
-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5]中国统计年鉴(1993)[K].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
-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孙兵]

Deng Xiaoping's Argument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WANG Xinsheng

(First Department, Party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80)

Abstrac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Deng Xiaoping made many argument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solved major problems for the circle of ideological theory. Deng Xiaoping's arguments embodied in such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his correct grasp of the theme and masterstroke for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Opium War, and to exact nourishment, increase wisdom, and acquire capacity. Deng Xiaoping's argument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provide an exceptional model of employing history to solve current problems.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Deng Xiaoping; modern Chinese history